

南海之声

美国彭博社日前报道称,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正向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施压,让其邀请乌克兰作为嘉宾参加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G20峰会。

这无疑又是给印尼出了一道难题。就连彭博社的报道都认为,此计划一旦成行,将让G20的会议安排和后勤保障“成为一场灾难”。

此前印尼坚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会,已令美国很恼火。在20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当俄方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时,以美国财长耶伦为首的美欧高官集体离席以示抗议。

美国对东盟的伎俩还有戏吗?

尽管美国持续施压,但印尼仍然希望G20这场汇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会议能够少些政治的味道。印尼外交部官员表示,印尼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主义的立场,希望通过国际法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各种国际争端。

印尼此时的境遇,很多东盟国家都感同身受。近一段时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大肆推行“印太战略”,游说、拉拢甚至胁迫东盟国家“选边站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前不久出席美国一家智库的

活动时表示,尝试围堵中国崛起不仅十分困难也不会有效。中美双方若能在开放的框架里合作寻求互惠互利,整个世界都会更安全和更美好。

这位刚被确立为未来新加坡领导人的最新表态也代表了多数东盟国家的现实态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站队,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另一方面,希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不能让东南亚沦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

日前,白宫高调官宣,曾“无限期推迟”的美国—东盟

特别峰会将在5月举行。对此,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社论称,东盟领导人当然不希望在美国对抗的背景下被视为美国的盟友。因为在经济上,中国对东盟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的确,在疫情阴影笼罩下,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合作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出现逆势增长。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今年一季度,东盟超过欧盟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保罗·亨勒认为,在东盟,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拿着枪支弹药来到谈判桌前,而中国是为了处理贸易和经济等问题。

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补足短板,拜登政府在去年抛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强化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本月初,在李显龙结束访美仅两天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匆匆地访问了新加坡,目的就是去推销“印太经济框架”。虽然场面热闹,但效果如

何恐怕还需要打一个问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太经济框架”提出的要求太多,如劳工、透明度、技术转移等问题,而给予亚太地区的利益太少,特别是一再强调不会对该地区放开市场准入。

无论是搅动G20峰会,还是利用什么“框架”来挑拨离间,美国的所作所为无非为了一己私利,与国际社会希望团结合作求发展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美国的逼迫利诱只能是徒劳无功,它抛出的难题早已有了答案。

从斯里兰卡“债务危机”看印尼债务

本报评论员:余凡

近三周以来,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斯里兰卡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引发全球关注议论。这颗印度洋上的“珍珠”已黯然失色,而她是如何走到这困境?能否重现光彩?

印尼CNBC网4月15日以“斯里兰卡陷于中国债务,印尼也会吗?”标题报道,自1948年独立的斯里兰卡,其经济危机已延伸到政治层面,数千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

据分析,造成斯里兰卡困局的原因是:过于倚重输入,包括燃料、农肥及其他必需品;而近来全球商品价格飙升,加重进口付出。而斯里兰卡货币贬值,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斯里兰卡央行(CBSL)行长南达拉尔(Nandalar Weerasinghe)向《路透社》承认:“我们必须优先输入基本必需品,而非付还外债。我们面对不能解决、极具挑战的还债临界点。”

截至2021年底,斯里兰卡的外债高达507.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PDB)的60.85%。而中国是斯国最大债权国之一,中国自2005年开始援助斯里兰卡贷款用作基建工程。其中包括以“一带一路”方案贷款兴建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国际深水港工程。

斯里兰卡曾是印度洋区域发展的成功案例,生产总值为巴基斯坦的三倍。但因连年内战,加上两年来总统拉贾帕萨(Gotabaya Rajapaksa)模仿西方政策而陷入经济危机,建国以来首次债务违约,引爆政治动乱。连僧人也上街抗争,形成跨种族和宗教的反抗力量。

如今,斯里兰卡民众每天缺水断电十多小时,通胀达18%,加油站大排长龙。该国卢比贬值近60%,而国债中有65%以美元结算。斯里兰卡又过早去工业化,工业生产总值占比由1977

年的22%跌至2017年的15%,根本没能力赚取外汇,不可能偿还现时的债务。

再把话题转回国内。一些“专家政客”以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为题,攻击佐科维总统“不断增加”向中国“贷款建设”的措施。但财政部已做出澄清,而根据印尼外债统计数据(SUL-ND)截至今年2月的资料,中国对印尼的贷款排在新加坡、美国及日本之后。另一方面,印尼的外债中以美元结算的高达2750亿美元,其次以欧元结算的251.5亿美元,以日元结算的有248.2美元;而以人民币结算的仅有43.1美元。

回顾《印尼CNBC》于2020年11月30日的报道,自从中国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及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OBOR)的倡议。为了能成为世界经济“新霸权”,中国愿意资助沿线各个国家兴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及海港设备。

在已拨发的贷款中,注重交通建设及能源开发,其次是基础设施,中国也愿意提供技术以及科技方面的帮助。西方集团担忧这是北京“新殖民主义”的起步式,以贷款为诱饵,获取相关国家的政治支持以实现成为“超级强国”的理想,实现掌控世界政治的野心。

CNBC网站显然与多数“亲西方”媒体一样,完全照搬美英的那套说辞,不分析缘由而一味指责中国让斯里兰卡、安哥拉等国陷入债务危机。还说:“何况如今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并需要大笔资金防疫,所以对于‘一带一路’贷款的协议国家及条件更为谨慎,分析认为,中国将优先满足表现更为‘忠诚’的国家。”这一年多前的报道,值得读者们玩味。

《亚洲周刊》第18期“亚洲焦点”刊载《斯里兰卡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评论:“美国政府及传媒一直将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在当

地发展‘一带一路’,而中国也在经营当地的汉班托塔港,因此反中势力一直说是中国的大白象工程引爆财务危机。”“斯里兰卡的债务结构为: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中国、日本和印度各占10%,而其余47%为私营银行贷款;以人民币结算的贷款不到2%。而私营银行的利息高达6.6%,是中国的一倍以上,因此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但中国必须“背黑锅”!

斯里兰卡本是农业国,但去年4月,拉贾帕萨效仿西方绿色环保口号,宣布禁止进口化肥,使全国农产量下滑为原来的25%,而种子价却贵了三倍。加上疫情使20万劳工无法到国外就业,而旅游业几乎崩塌,经济停摆。虽然政府又允许进口化肥,但粮价已飙升。

拉贾帕萨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盲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低税率政策。1990年至1992年,政府税收占全国生产力的17.2%,而2019至2020年,下降至8.4%。非税务收入对生产总值占比也由2000年的2.3%,下降至2020年0.9%。把增值税由15%下调至8%,企业所得税由28%降至24%,其政府税收已下跌为发展中国家最低之一。

据闻,印度已同意延迟了斯里兰卡14亿美元到期债务,并提供5000万美元购买能源。世界银行给予斯里兰卡至少3000万的救助金,斯里兰卡的前联合国代表帕利沙·科霍纳(Palitha Kohona)表示,他“非常有信心”中国会给予约25亿美元的援助。而汉班托塔港在中资企业倾力经营管理下,收益颇丰,开始拉动当地及斯里兰卡的经贸发展。

斯里兰卡的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应拟定适合本国特色的经济政策,别向西方盲目“跟风”。佐科政府近年的基建、工业布局与出口措施,能让本国免于“债务危机”。

当心美国酝酿的“东亚乌克兰”

廖省:林越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于4月20日至22日在海南省博鳌镇举行。本届论坛以“疫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为主题,围绕着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疫后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凝聚共识,谋划未来发展方式与方向。

论坛秘书长李保东称,为期3天的论坛举行了30多场分论坛活动,主要讨论疫情防治、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以及亚洲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的新发展。论坛将探讨如何用好RCEP的机遇,如何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会议认为需要果敢、坚毅地共同面对、破解人类社会难题;需要支持彼此抗疫努力,早日战胜疫情;需要恢复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与培训;需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拥抱绿色产业革命机遇;需要加强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与跨境合作;需要抓住RCEP正式生效的时机,推动亚洲经济融合与大市场建设,强化产业链韧性与协作。

中国习近平主席在21日的开幕式视频讲话中提到:“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矛盾并不可怕,正是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

习主席还表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

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西方媒体把这番话解读为普京辩护,因习主席强调“世界各国乘坐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脱钩、断供、极限施压的行径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搞小圈子、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立对抗也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回顾4月6日,为期两天的北约组织举行外长会议,日、韩、澳、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外长也被邀请比利时与会。北约开会,亚太国家为何出席?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此次会议实际上是西方军事集团的一次重要集结,被形容为“重要里程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毫不掩饰会议本质,甚至挑明其“新战略构想”,要首先考虑针对中国。

《亚洲周刊》第18期刊载丁果《习近平博鳌释放重要信息 中美防长通话防止误判》的评论:“习近平博鳌发言被西方误读为俄国辩护,其实中国吸取俄国的教训,警惕美澳让台湾、韩国变成‘东亚乌克兰’的危险。”“北京充分看到了俄乌战争对俄国带来的巨大风险,这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警钟。”“北京采取事先预防的姿态,警惕美澳在东亚推动‘北约东扩’的招数,……将北京卷入战争泥潭,来削弱北京乃至拖垮北京。”

当俄乌战争推高油价及通胀时,中国实施上海封城,对世界经贸影响巨大,以至西方抨击中国的“动态清零”和封城政策。但中国的“睦邻”显然有效,多国元首及国际货币基金总裁都应邀出席论坛。菲总统杜特尔特拒绝参加拜登主办的美国—东盟峰会,却到博鳌与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

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西方媒体把这番话解读为普京辩护,因习主席强调“世界各国乘坐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脱钩、断供、极限施压的行径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搞小圈子、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立对抗也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日本外相林芳正4月22日在内阁发表2022年度《外交蓝皮书》,声称“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世界已正式进入中美竞争、国家竞争的时代”。指中俄维持紧密关系,成为日本安保方面的关注事项。日本妄想借俄乌战争之势,争取扩大军备,重温其“军国梦”。

4月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防长魏凤和应约同美防长奥斯汀通了45分钟电话,是登上台后中美防长首次通话。奥斯汀告知,美方虽打台湾牌,但没有意图改变“一中政策”,敦促北京不要误判,在台海挑起战端。并试图改善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危机沟通。

中方当然知道美国的底细,因此在通话中要求美方“停止在海上进行军事挑衅,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抹黑栽赃、威胁施压”。提醒美国若干涉台海,将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风险。北京也慎防美英澳日韩等携手筹建“亚太北约”,围堵中国。

《金融时报》于27日称,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伦敦发表“事先精心安排的鹰派演讲”,矛头直指中国。她说:“北约必须放眼全球”,“先发制人,防范印太的威胁”,妄称要“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是西方霸权妄图“北约全球化”最露骨的表现。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同时,英美澳一些政客幻想“精神控制”,重新树立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全球“优越性”,为自己的“尊贵身份”而自豪。这些政客可能忘了,在多数民众眼中,他们只不过是系着“仁义道德”领花,“民主自由”彩饰的“搅屎棍”!

当然,也有经济因素。当被问及为何华人主导了羽毛球运动,梁海量回答道:“我觉得其原因在于,并非每个家庭都能玩得起羽毛球。在室外打不需要多少钱,但在室内打就非常贵。”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办法去价格高昂的运动馆练习的球手,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而这些人往往来自华人家庭。

这一观点也为纪明发所认同。他曾获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和混合双打冠军。他说,他一开始在室外打球,只能打到地区冠军,但自从受邀在朋友黄辉建(Oey Hwie Kian)父亲的酒店室内运动场打球后,他就获得了国家冠军。

另一个经济因素是商业赞助。羽毛球俱乐部的赞助商中,最重要的赞助来自华人大企业,包括一些烟草公司,比如烟记公司(Djarum)

和盐仓集团(Gudang Garam)。雅加达的唐卡斯俱乐部(Klub Tangkas)是其中一个在羽毛球发展史上表现突出且富有影响力的俱乐部。20世纪50年代,该俱乐部由苏汉迪纳塔(Suhandinata)家族经营,并由杜纳斯·萨地集团(Grup Tunas Sakti)、比曼达拉集团(Bimantara)和波卡沙利集团(Bogasari)赞助。2007年,俱乐部的赞助商换成了阿尔法零售集团(Alfamart),俱乐部的名字也改成了当卡斯·阿法玛俱乐部(Tangkas Alfamart)。芝布特拉集团(Ciputra)和比曼达拉集团为印尼羽协各类活动提供赞助,直到1997-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

笔者在雅加达采访的几位研究和工作人员认为这里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华人的文化强调运动员必须具备坚定的意志、高度的自律和必胜的决心以及

华人与羽毛球(4)

科林·布朗(COLIN BROWN)



汤姆斯杯印尼参赛队谒见苏哈托总统(1976)

其他类似的宝贵品质。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宝贵品质推动华人选手们为了成功而不懈努力。

但事实上这些华人羽毛球运动员的背景又是怎样的呢?笔者研究了所有在《印

瓜哇、巽他等融合而成的独特文化,中华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因此,很难用这一点来解释当事人作为羽毛球运动员能如此成功的原因。

也许华人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在于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就像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一样,对印尼华人来说,尽管非常有限,但公平、开放的赛场是一个能被看作和印尼原住民群体拥有同等地位的场合。可以说羽毛球领域没有歧视,即使有,影响也很小。在国际赛场上,影响最小。毕竟体育运动秉承着“任人唯贤(Meritokrasi)”原则,最优者即胜者,无关其族群或文化。

四、结论 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个世纪,印尼一直是羽毛球运动的世界冠军。因此,羽毛球为印尼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和增强民族特色与民族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在殖

民时期,羽毛球却没有像其他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那样显现出民族主义元素。

几乎所有印尼人都可以打羽毛球。但印尼最拔尖的羽毛球运动员大多是华人。当然,华人也活跃在其他领域,如艺术、文学、医学和教育。但与这些领域相比,华人在羽毛球运动上显然更为杰出。

体育运动能团结多元民族国家这一作用已在其他国家得到证明。很遗憾的是,尽管华人一直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与才能,冀望某个“团体”能变得更强大、更显赫,但这个“团体”有时却并不承认华人是和其他印尼公民同等的成员。

本文摘自科林·布朗所著《博弈:印尼羽毛球运动的族群与政治因素》。(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